

华大学人研究书系



# 钱基博学术研究

Qian Jibo Xueshu

王玉德

主编

# 钱基博学术研究

华大学人研究书系

Qian Jibo Xueshu

王玉德 主编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基博学术研究/王玉德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622-3697-9

I. 钱… II. 王… III. 文史哲—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3909 号

## 钱基博学术研究

---

主编:王玉德

责任编辑:沈继成

责任校对:张忠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380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3.75

版次: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2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 目 录

在钱基博与国学研讨会上的致辞	马 敏(1)
在钱基博与国学研讨会上的讲话	章开沅(4)
《堠山钱氏家谱》、家学与家风	曹毓英(6)
钱基博及其家族的士绅行为	王文军(30)
钱钟书为钱基博“代笔”考	刘桂秋(39)
浅析钱基博父子两代知识分子间的代际发展	谭春玲(49)
文化两昆仑,史林闲思谈“二钱”——钱基博与钱穆	孔祥增(65)
再读《〈老子·道德经〉解题及读法》	熊铁基(76)
论钱基博的《庄子》研究	肖海燕(80)
回忆钱老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史	崔曙庭(91)
钱基博:语文教学改革之先驱者	周英姿(100)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谈钱基博和教育	吴 俊(106)
关于钱基博的一则教学新史料	温 敏(113)
钱基博:一代国学大师	王玉德(121)
钱基博先生的目录学思想及成就	徐艳芳(136)
辨章学术,牖启途辙	
——钱基博经典要籍解题著述发微	涂耀威(148)
钱基博古籍解题管窥	史振卿(158)
钱基博先生《治学篇》析论	
——兼与张舜徽先生之比较	田 君(165)
读《〈国学文选类纂〉总叙》	王丽明(188)
试论钱基博的国学分类思想	汤红兵(197)

钱基博经学思想研究	李文涛(203)
钱基博文史教育述评	伍大福(210)
钱基博教育思想研究	姚 峰(221)
钱基博文学史观考辨	胡鹏林(227)
钱基博与中国近代文学	张筱南 程翔章(236)
<b>博古通今 藏往知来</b>	
——论钱基博先生的现代文学史观	姜晓云(243)
从《现代中国文学史》看钱基博的民族主义思想	胡悦晗(261)
钱基博与《孙子章句训义》	沈丽娅(273)
治心之学与技击——读钱基博的《技击余闻补》	莫 暝(286)
钱基博论曾国藩	张军占(296)
钱基博的奥地学思想——兼论晚清地理学发展	刘国旭(303)
钱基博社会公益事业述论	刘 琼(311)
钱基博在国立师范学院	孔春辉(320)
钱基博先生与华中师范大学珍藏文物	丁毅华(330)
钱基博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	邹 霞 桂 涛(337)
略议钱基博先生赠书	陈亚敏 王宏强(347)
钱基博文化观浅议	马树华(352)
钱基博的时代精神、民族气节及师表风范	笪浩波(361)
<b>淡泊明志，宁静致远</b>	
——国学大师钱基博人格魅力解读	刘 双(368)
<b>忠肝义胆 学人楷模</b>	
——抗战时期钱基博的爱国情怀	张佩佩(376)
钱基博抗战思想简论	吴兴星(388)
琐窗寒——为纪念钱子泉师而作	邓志瑗(398)
关于钱基博先生被打成右派的误传	喻枝英(400)
纪念国学大师 弘扬国学精神	许 刚(404)
钱基博先生学行小传	姜晓云(410)
钱基博与国学研讨会综述	沈丽娅(430)
后记	(435)

## 在钱基博与国学研讨会上的致辞

马 敏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老师们、同学们：

上午好！

今天是钱基博先生诞生 120 周年的日子，我们欢聚一堂隆重举行钱基博先生学术研讨会，就钱基博先生生平事迹、学术思想的研究开展对话、分享经验、交流成果，意义深远。这次会议是由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倡议的，得到了各方面的响应，钱基博先生的亲属钱校汝先生等人为此专门来到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也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傅宏星先生编撰的《钱基博年谱》。在此，我谨代表华中师范大学向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钱校汝先生以及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钱基博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古文学家、国学大师。他治学范围极广，博通四部之学，有“集部之学，海内罕对”的美誉，他在解放前撰写了十多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构成了独到的国学体系，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国学研究。他治学严谨，文风独特，给学界以纯真、朴实、清新的深刻印象，堪称治学育人的楷模。

钱基博先生也是我国杰出的教育家。他从事教育事业 44 年，先后在小学、中学、大学工作。他以人格魅力垂范后学，甘为人梯，提携后进，培育栋梁，被其弟子称颂为“精神博大，一代宗师无愧，似花工，终生灌园，五洲四海多桃李”。他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如教育救国须先重视师范教育的思想，“师范生一支笔”的先进教育理念，对学生要正面教育的思想等。这些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对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和改革依然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钱基博先生与华中师范大学具有深厚的渊源关系。他1946年就来到我校前身之一的华中大学任教,把自己的晚年都献给了华中师范大学,为华师中文和历史学科的发展、为华师学术梯队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但教书育人,还关心华师的发展,为学校共捐献了5万余册藏书、230多件珍贵文物,还亲自撰写了《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陈列品研究报告》,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的建成奠定了基础。我校历史博物馆现在还保存着钱基博先生当年给杨东莼院长的报告、开会的记录、关于馆藏文物的说明以及钱基博先生捐献的文物。

钱基博先生是一位耿介的知识分子,他爱国爱党爱民族爱华师,曾经为华师的建设进言,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建言,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怀,是一位值得我们纪念的学者。

一个民族的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光。特定时代学术精英的活动,往往蕴藏着超越特定时代的价值。加强对钱基博先生的学术思想研究,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华中师范大学对钱基博先生的研究已经持续了20年。1987年,华中师大报推出了《纪念钱基博先生诞辰百周年专辑》。后来,华中师大出版社又出版了《钱基博学术论著选》。今年又出版了《钱基博年谱》,还在商议出版《钱基博全集》。这两年,历史文化学院为研究生开设了研究钱基博的课程,一批研究生对钱基博展开了研究,形成了钱学研究的生力军,为钱学研究作出了新贡献。

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钱先生的生平考察、著作整理、文献学思想以及教育改革思想等几个方面。因此,钱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发掘空间。首先,要加强对钱先生论著资料的收集整理,使之系统化、全面化,这是基础;其次,要加强对钱先生教育思想的研究,这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三,要拓展研究领域,比如加强钱先生在文献学、文字学等方面学术思想的研究,形成新的研究成果。

钱基博先生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不仅是钱基博先生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的盛会,也为华中师范大学提供了一个学习求教、交流沟通、展现成果的机会。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本次学术研讨

会定将成为一次交流经验、增进了解、加强合作和激发创新思维的盛会。华中师范大学将继续支持对钱基博学术的研究,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推进钱基博先生学术思想研究的不断发展,为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国学作出新的贡献!

预祝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 在钱基博与国学研讨会上的讲话

章开沅

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学者：

今天是个纯学者的会议。刚才谈到我倡议召开此次会议，感到很惭愧。我在华师已是第 56 个年头了，人生苦短，没能做的事很多，此时我脑海中又浮现了八个字：“未尽之事，未了之情。”对钱先生的纪念，对其学术的弘扬和美德的推广，皆缘于此。钱先生是抗战胜利后从湖南调到华中大学任教的，我是 1951 年来此的，所以刚到校就有幸得遇钱先生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真正的国学大师。对钱先生的看法我都写在 20 年前的《纪念钱基博先生诞辰百周年专辑》上，限于时间，我今天只谈三个问题：

第一是钱先生在 1949 年后的表现和遭遇。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钱先生在 1949 年以后是位非常爱国、追求进步的儒者。因为尽管他由于嗓子等问题课上得不太好，但是他对青年教师表现出了无私的关怀，又把自己多年的藏书都捐献给了图书馆，帮助我们成立文物馆，并不是所有的老学者都这样做的。此外他还非常热心政治学习，热爱共产党，热爱并十分钦佩毛主席。《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式出版后，他整整花了十天时间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认真研读，而且还做了大量的眉批和笔记，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际上，当时学校对钱先生并没有像对待青年教师那样作政治学习的要求，一切都是他主动做的，对《实践论》、《矛盾论》都有很深刻的体会，这在当时是十分不容易的。1957 年，由于他响应党的号召，热爱国家，希望国家一年比一年更好，遂知无不言，事实上也没有言辞过激。钱先生的直言，反映出钱先生在任何条件下都无怨无悔地把生命献给他热爱的国家，献给他视同生命的中华文化。

1962年,我因到南通查找张謇的资料,很多人询问我钱先生是否划为右派。经过我的了解和后来核实,钱先生确实未划为右派,只是组织上向他转达了一些批评意见,但是,对一个高龄又病重的人,这样做也是不人道的。

第二是有关1987年钱先生的百年诞辰学术会议,是钱先生的故旧,主要是他的学生,特别是蓝田国师的学生们发起的,由于他们跟随钱先生时间最长,故而感情最深。1987年由于我任校长,于是召集了那次会议。这次会议十分简单,参与者也是很普通的文教界人士。

第三即是钱先生与国学的问题。我们丝毫没有把钱基博先生与时下的国学热完全地联系在一起。提倡国学是好事,但是国学热这个现象却值得深思,它是由于“唯上”即只为迎合某个政府官员的提议一拥而上或者商业炒作造成的,很多人没有读过国学入门的典籍却大谈国学,自称大师,十分荒谬。这是一夜暴富心理在国学中的渗透。我们并非一味古板地反对利用媒体、利用浅近、贴近生活的语言去普及国学的知识,引起民众的兴趣或其他生活方面的感悟,这一切都是好事。不能自己做不好就不允许别人做,别人做了就不高兴,酸葡萄心理,这是不对的。应该也感谢有些人在当中做了些有益的工作。但是这却不能代替国学研究。国学研究从注音、认字开始,即小学。因此,对待国学,一种是更深入地研究,就需要更高深的理论;另一种是弘扬传统文化的精神,就需要了解国学常识,做起步工作,这是目前急需的,特别是文科的同学,但是要学会正确去对待。正因为此,今天我们纪念钱老,来追忆逝去的儒者,一位真正的当代大师。

最后我有个建议,下次我们可以召开无锡二钱(钱基博与钱穆)的学术会议,因为此二人有着相同的经历,是真正的国学大师。建议邀请海峡两岸甚至海外的学者来共同参加。举办这样的会议,可以激发更多的人来研究真正的国学大师、研究真正的国学。

(沈丽娅记录,未经章先生本人审核)

# 《堠山钱氏家谱》、家学与家风

曹毓英

钱基博先生于1948年夏所撰的《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不仅是研究钱氏家族及其成员的重要历史资料，而且是研究其家学渊源和家风的重要史学资料，这是研究钱学的第一手资料，是最难得可贵的。尽管历史上也不乏有人写家谱和家传等书，但是能真正保存下来的不多，钱先生的家谱之所以能保存至今也是一件幸事。

这是由于上世纪解放初期，钱先生将几万册珍贵的图书和一批历史文物主动捐赠给了学校，这本家谱也在其中，它现仍藏于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否则可能随同他的几百本读书笔记和手稿一起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其实它还逃过了另一劫，“文革”前夕我曾到图书馆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时前馆长甘连笙先生交给我一项特殊任务，即将近年来中宣部、文化部下达文件所规定要查封和销毁的图书予以清理后进行处理。经过清理后已是“文革”初期了，因为都是按“人头”所作的规定，大多数图书并不一定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极少数，我不主张销毁这些图书，但这是大冒风险的事。于是我向馆长建议，将这些图书全部封存，待运动过后，再请示上级进行处理，当时馆领导经过研究同意我的意见，专库进行封存。钱先生1957年因为给当时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上过万言书，被错误地定为极右派分子，那时极右派分子的书在规定销毁之列，所以钱先生的有关著作及其家谱均在被毁之列。由于这是按中央文件封存的图书，故在扫“四旧”和多次的打砸抢中人们都不敢动它。至于当时被烧毁的钱先生书稿和笔记本等，均藏于石声淮先生家，不过当时被烧毁的钱先生全部手迹中，只有一本书人们不敢烧，那是1951年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钱先生怀着激奋的心

情，十天之内便读完全书，信手在扉页上写下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籀绎》，人们不仅不敢烧掉它，而且连扉页也不敢撕下，当时遇巧留下了钱先生这唯一的手迹。后来我将它发表在学报纪念钱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的专辑上。因为这是当时所能寻得的唯一手迹。

下面将分别论述：家谱的由来，钱氏谱系，丹桂堂家谱之世表，钱氏家学及其渊源，钱氏家风的传承。

## 一、家谱的由来

中国古代早有记述氏族世系的书籍，《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十表”等实际上与谱牒有渊源关系，只是古代那些最早的谱牒于今难以再见到了。现在只有《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的姓氏、世系、居地和制作等项，是一部综合谱系。依此说，它可能产生于战国时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谱牒之类的著作。故司马迁的《史记》十表，就是参照《世本》的精神和采取谱牒旧闻而作的。《太史公自序》：“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又说：“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纪；而谱牒经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那么以下《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等七种都是依据当时的历史记载所作。自然，这些都是为帝王、诸侯、将相、名臣或士大夫所作的世系和年表。依例，后来的姓氏族谱、宗谱、支谱、家谱、个人年表、家乘、私乘和邑乘等相继逐步兴起。这都是人文文化日益深入发展和进步的结果，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人文学说的意义，是不可简单地以门阀观念去衡量它的。所以，这历来是被当作历史文化和人文发展来记述的。因为人们可以循此寻根问祖，以研究人文文化的发展轨迹。

此事，战国时孟子就曾说过：“《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离娄下》）晋之《乘》即指晋的史书，孙奭疏：“以其所载以田赋乘马，故以因名为乘也。”按此说当为经济类史书，如《管子》一书中有“乘马”、“臣乘马”、“乘马数”、“问乘马”等

篇，都是以论述经济问题为主的，加上田赋，自然是以经济史为主。后来朱熹注：“或曰，取以载当时行事而名之也。”由此说便改为一般记事的史籍。后以史籍为记事之书，故称一般史书为“史乘”，也借以称家谱之类为家乘、私乘。楚国的史书称《梼杌》，鲁国的史籍称《春秋》，所以说“一也”，都是《春秋》之类的史书，不过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有三传中保存的“春秋”，其中又以《左传》中的较完整。

《隋书·经籍志》著录：“《世本王侯大夫谱》二卷；《世本》二卷（刘向撰）；《世本》四卷（宋衷撰）。”并说：“氏姓之书，其所由来远矣。《书》称‘别生分类’；《传》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周家小史定系世，辨昭穆，则亦史之职也。秦兼天下，铲除旧迹，公侯子孙，失其本系。汉初得《世本》，叙黄帝以来祖世所出。”可知《世本》为汉初所得，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那十五篇，也就是以人文文化的典籍著录于史。汉代以后此类谱系的著作逐渐多起来，并兴起了谱学。因魏晋南北朝时重门第之风兴起，有司选举必稽谱牒，谱学成了官僚阶层保持门阀的工具。晋太元中，贾弼撰《姓氏簿状》，子孙相传，号称为贾氏谱学。南朝梁王僧儒因袭贾弼旧本，改撰为《十八州谱》等书，又号为王氏谱学。北魏太和中，诏诸郡中正各立本土姓族，次第为举选，名“方司格”。所以那时谱学较为兴盛。据刘孝标注为刘义庆《世说新语》作注，除了引用自先秦以来的著作之外，仅引用晋代史籍、谱录等达一百六十六家，而其中仅谱状类就有四十六种。这四十六种只有《傅氏谱》、《谢氏谱》和《杨氏谱》三种被后来的《隋书志》所著录，其余均已不存。刘孝标注引的这四十六种谱录都是家谱类，基本时限在晋代以内，一般只记十二代以内的人物。虽然，他引用的都只是一鳞半爪的，但是足以说明谱牒之类的著作保存了极为丰富而且弥足珍贵的文化史料，对于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和文学著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如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年间，因魏收所写的《魏书》不公，引起群臣公愤，纷纷向朝廷告状，故皇帝“敕《魏书》且勿施行，令群臣博议。听有家事者入署，不实者陈牒”。其实当时《魏书》所记不仅有不公、不实者，还有篡改、甚至大量不记的。“于是众口喧然，号为‘秽史’。投牒者相次，收无以抗之。”当时朝臣和地方官纷纷拿出自家的谱牒以资作证，使魏收无法抗辩。左右二仆射杨愔、

高德政权势倾朝野，与魏收皆为亲故，故魏收为二家作传特褒扬之。因此，杨愔对魏收说：“此谓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这是对于他所偏爱之家族才如此，而对于他不喜欢的人家，或有恩怨者一概不写，而杨愔所指出的只是某些缺陷，魏收则辩解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支流。望公观过知仁，以免尤责。”从这一事件及魏收的话中可知以往历史上一姓一族大都修撰有谱牒。故后来《隋书志》所记大量谱牒已遗失当是实情，也充分说明谱牒对编撰国史具有何等重要意义<sup>①</sup>。

《隋书·经籍志》明确记有“谱系编”，“今录其见存者”有“四十一部，三百六十卷”，自余亦多遗失的通计有五十三部，一千二百八十卷。刘孝标注所注引的四十六种家谱有四十三种不见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可知这都在遗失之列。唐太宗、武后时曾修订《氏族志》，路敬淳、柳冲、韦述等人都讲明谱学。《旧唐书·经籍志》则将史类分为十三目，其“十二曰谱系，以纪世族继序”。故其著录“谱牒五十五部，凡一千六百九十一卷”。其中已有与《隋书·经籍志》所记相同，而新加的有《褚氏家传》、《殷氏家传》之类多种；还有《裴氏家记》、《孙氏谱记》、《明氏世录》、《裴氏家牒》等诸名目。《新唐书·艺文志》将史类循《旧唐书》旧例分为十三目，其十二仍为谱牒，除多数旧书目相同之外，新增有《家谱》、《谢氏家谱》、《薛氏家谱》、《颜氏家谱》等二十种；还有《赵郡东祖李氏家谱》、《李氏房从谱》、《韦氏诸房略》等支谱之类，即编目越分越仔细了。《宋史·艺文志》将史部仍分为十三类，而改为“十一曰谱牒类”，只录有谱牒一百一十部，其中家谱已增加不少，有二十五部；另有《春秋氏族谱》、苏洵的《苏氏族谱》、钱惟演的《钱氏庆系谱》等。故家谱在晋代之后，于唐宋时又继起。不过各家的记载不同，郑樵的《通志》著录的谱系只有六种，一百七十部；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时，所存者只有数家。《明史》史部分为十类，谱牒为第十类，收有三十八部，五百〇四卷，虽说明代私家记载为多，然而却未见著录，其中只有凌迪知的《历代帝王姓系统谱》六卷、《姓氏博

<sup>①</sup> 参见拙著《国学·乙部·移史不废的魏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160页。

考》十四卷、《万氏统谱》一百四十卷的综合谱牒。《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叙》说到：“旧有谱牒一门，然自唐以后，谱学殆绝。玉牒既不颁于外，家乘亦不上于官，徒有书目，故从删焉。私家记载，惟宋明二代为多。”故将史部分为十五类，而谱牒列为末类，却未收其目。这就是中国谱牒之类的概略记述，可知其对研究历史文化和人文文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 二、钱氏谱系

何谓谱？谱在古代被看成一种书记类的文体，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有云：“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故谓谱者，普也；注序世统，事资周普。”这就扼要地叙述了谱的性质、主要内容及其功能。在中国历史上，谱的种类纷繁复杂，本文不能具体地去进行分类研究，因本文主要是探讨钱氏家谱，所以首先要弄清它的谱系。这是每一种谱的中心内容，钱先生修撰的虽是其家谱，但是他首先要追溯其钱氏的来龙去脉，这是姓氏类谱籍的共同任务，故其将钱氏上溯至黄帝的后裔，下迄无锡堠山钱氏的由来，将几千年来钱氏的世系连接起来，然后才可详叙其家族世系和各代的系列及每个成员的状况，即将世系与世表相衔接。故述谱系为第一。钱先生在《无锡光复志·自叙》中所述：钱氏“得姓于三皇，初盛于汉，衰于唐，中兴于唐宋之际，下暨齐民于元明，儒于法”的谱系。其实这也是遵其老父福炯先生的遗训而来，福炯先生在《续修钱氏宗谱》及其《序记》中也追述了这些内容。故基博先生在《家谱》中又追述：“钱氏，其先祖出自黄帝。”黄帝是汉族百家姓氏共认的始祖，或可称汉族的始祖。依据《史记·五帝本纪》和《路史疏》等书的记述，黄帝者，少典之子，长于姬水，因以为姓。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曰玄嚣、曰昌意。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sup>①</sup>，生帝颛

<sup>①</sup> 按：《蜀国春秋》为景卜（原文为女旁），而《竹书纪年》记为：“母曰女枢”，注引《蜀国春秋》曰：“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景卜（原文为女旁繁体字），生乾荒。乾荒娶蜀山氏女曰枢，生颛顼。”所以此有两说。故检索《国语》、《竹书纪年》、《山海经》、《世本》、《家语》等书，对远古记载有出入。

项高阳。高阳生伯称、卷章、季禹三人。伯称之为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重黎生回，回食于吴，是曰吴回。回生陆终，陆终娶鬼方氏曰嫫，生子六人，曰樊、曰惠连、曰钱、曰求言<sup>①</sup>、曰晏安<sup>②</sup>、曰季连。钱之子铿，封于彭，是为大彭，彭祖以斟雉养性事放勋。夏之中兴，别封其孙元哲于韦，是为豕韦。迭为夏，伯夏迁于商。老彭守官大夫，商王致采女受术，钱始去之，终身不见，寿七百六十七，先后丧妻四十九，生子五十四，而第二十八子孚，仕周文王，官钱府上士，始以官为氏，而传四世，称为钱氏，而称钱氏者，疑从彭祖之名钱（原文有竹头），去竹为氏。如黄帝臣太山稽之后为稽氏，商汤王之后为汤氏，以名为氏，而非以官命氏也。此述钱氏及其他姓氏之来历，而黄帝只有一人，其后姓氏逐渐增多，至唐宋时汉族的姓氏已超过百家，至清代雍正初年已增至四百五十家以上，此时可能有少数民族姓氏与汉族姓氏相混杂的情况，也或许这种情形历来都有。

钱姓已定，此后史籍便逐步有明文记载，于是传二十二世而至钱丹，唐代林宝的《元和姓纂》每姓各载受氏之源及诸家谱系，于钱姓所记：“战国时有隐士钱丹，秦有御史大夫钱产，子孙居下邳者也。”又七世而有钱林，曾为谏议大夫，因王莽篡汉，从下邳迁于长兴陂门里梓山之东而居。林生宪、宪生敞，事光武帝，为祠部郎。敞子朔，仕黄门侍郎，至明帝永平初，历骑都尉、代郡太守。朔子咸，曾为祁门将军，高密太守。咸生隐，隐生冲，冲子让，在广陵太守任上，假节以征东将军，因讨贼有功封为富寿侯。有五子：承、京、晟（此三子乃东海徐氏所生）、耽、京（此二子乃继室皇甫氏所生），此第五子京历东官舍人、太子洗马、黄门侍郎、高密太守、右将军。京亦有五子，仲子宝，宝有二子：典（原文左为衣旁）、睦。睦子二，长为秀。自宝以下三世仕孙吴，吴亡，秀之长子广，后事梁惠帝，领江州刺史，任征虏将军，督江东诸郡，因有军功，逝后追赠为永安侯，谥曰忠。广有五子，次曰弥，弥生玮、玮子兴德，兴德子

① 苏洵：《嘉祐集族谱后录》作“来言”，《武肃王谱》作“永言”。

② 苏洵：《嘉祐集族谱后录》作“安”。关于卷章、重黎及回等，《路史》、《吴越钱氏大宗谱》与苏洵所述都略有异同，在此从略。

伯仁，伯仁有女宝媛适陈文赞，生子霸先，后为陈高祖，伯仁后被追赠为临川郡王，有子五人，长肃之。肃之生道始，因佐命有功追授扬威将军，为本郡刺史，有子六人，六子智昌累官宣城太守，加仁威将军。其长子袭爵，陈亡入隋不仕，至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卒，有三子，长曰元修，后有功拜扬威将军。元修有二子，长曰孝悌。孝悌有七子，长曰师宝。师宝生仁昉。仁昉生硕亶，是为吴越武肃王高祖，至此只论钱氏直系已六十七世矣。其六十八世为武肃王曾祖讳沛，生二子，次曰宙，是为武肃王钱镠之祖父，子宽，钱宽累进太府少卿，加朝散大夫检校礼部尚书。自其子钱镠封为吴越武肃王，历五代至宋有三世五王，及其子孙皆居显位。

因唐贞观七年下诏征索天下氏族谱牒，钱元修录钱氏家谱呈京师。后至钱镠封为王，特修世谱家传，成钱氏大宗谱，起自少典，下讫本朝。因自钱镠起，三世五王、钱镠封吴越国王，谥曰武肃；钱元瓘为镠第五子，三次封王，先封为吴王、后封为越王、三封为吴越国王，谥文穆；子佐（本名宏佐）嗣，三世都为兵马都元帅，封为吴越王，谥忠献；其弟宏继位，代佐为元帅，被部下大将密谋幽禁，是为忠逊王；异母弟宏俶被迎立为元帅，后亦封为吴越国王，复加天下兵马大元帅，至宋初，为元帅长达三十五年，追封为秦国王，谥忠懿。异母弟宏俨，官至节度使，先后知湖州、判和州，因其嗜学，博涉经史，著有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并撰《吴越备史》十五卷，《备史遗事》五卷，《忠懿王勋业志》三卷，《贵溪叟自叙传》一卷等。至钱惟演撰有《钱氏庆系谱》三卷和《钱俶贡奉录》一卷，及此，钱氏便有宗谱、家谱、家传和编年史（《吴越备史》实为编年史）等均具备。加上新、旧《五代史》和《宋史·吴越世家》，史籍记载甚为丰富。

钱俶有九子，钱惟演次居第八，宋代著名文学家和诗人，历右屯卫将军、右神武军将军、太仆少卿，后以兵部尚书拜枢密使、保大军节度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改武胜节度使、判河南府，晚以崇信军节度使判随州，于景祐元年夏薨于随，谥曰文僖。惟演有子十一人，其中曄、晦、暄三人居位最高，钱暄为第六子，以父荫累官驾部郎中，知抚州、台州，神宗时改为光禄卿，出知郓州、拜宝文阁待制，于元丰八年卒，赠太师，追封冀国公。钱暄有子十二人，其九曰景臻，累进金紫光禄大夫、检